

通往朝鲜战争之路 - 两大阵营的外交传统和决策

陈潇

一：导言

朝鲜战争是一个随时可能成为热点的话题，尤其因为这是二战后两大阵营的首次军事冲突，并且作为弱势一方的中国在战场上与美国人打了个旗鼓相当，所以这场战争在中国被赋予了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暂且抛开那些依靠二手史料的推测性历史论文以及专门用来意淫而编造出的所谓西点军校军官访谈，专就大部分相对稍微专业一点的作品来说，对朝鲜战争感性上的渲染似乎远远超过理性上的剖析。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尤其容易发现两类看待历史的通病：一是以本方阵营为中心的叙事结构，突出中国方面作战的艰苦和辉煌战果；二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和思维去构思、套弄当时决策层的想法。后一个问题尤其流行的表现是，很多人都默认“冷战必然开始”、“德日将成为次要角色”或者“世界大战将不会爆发”来看待 1945 年到 1950 年美苏双方的一系列行为，丝毫不考虑领导人的信息失真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在这个基础上，对朝鲜战争认识的简单化像病毒一样肆意蔓延。

朝鲜战争问题的复杂在于，任何一方的决定都是多层面考虑的结果，包括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小误会造成的偏差判断。此外，在两大阵营内部，又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尤其是中苏两国作为事件核心而意见常常相左，对战争的爆发和扩大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复杂性远远超出某些“爱国者”的认识范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尽量把所有能够解释战争起因的因素都代入本文，努力使各位读者明白，在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间，在捷克和台湾海峡之间，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大使发回本国的电报之间，在 1945 年和 1950 年之间，甚至更久远的过去，都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而又是坚固的联系。这些联系最终的爆发点是朝鲜半岛，但它来源于全世界，其影响也很快扩散到了全世界。

一场战争的起因往往要从前一场战争的结束中寻找。大量资料雄辩地证明了朝鲜战争与二战结束后美苏双方对战后世界不同的态度、互相间力量和策略的博弈紧密相关，和中国内战的结果、中国新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利益纠葛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的文章将从 1945 年甚至更早、而不是 1950 年开始阐述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

写作本文的优势在于我掌握了一些相当出色的专业作品。其中最主要的大部头著作包括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教授的代表作《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以及闻名遐迩的基辛格博士的经典作品《大外交》。前者建立在对俄国解密档案的深入分析上，一手资料非常丰富。后者以一个现实主义专家的眼光讨论了几百年的国际关系兴替，在朝鲜战争的相关章节，以地缘战略为出发点，揭示了当时西方阵营所得到的信息和做出反应时的动机。另外我还将借助几年前一度流行的王树增的《远东 朝鲜战争》一书。这本书的文笔抒发了很多中国人对朝鲜战争的情感，但在专业性上与前两者相差甚远。立场明显，观点殊不可信，笔者将着重于书中引用的一手材料。

我将首先论述苏联的外交政策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接着讨论二战后双方的猜疑和应对，再聚焦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然后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描述美、中先后参战的原因和过程，文章的最后稍微讨论战争扩大的合法性等相关问题。起初我构思本文时野心很小，随着阅读相关资料我难以抗拒去构筑一个浩大的工程。我希望以本文作为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结束即是针对我国各大 **BBS** 长时间以来对朝鲜战争重复的低水平讨论以及某种表面意气风发的讨论态度。开始即是开始一种非专业人群在网络讨论中对战争起因和意义的相对专业的挖掘。这项工作无疑是艰苦的，意义也相当深远。

二：正文

A：苏联外交战略

1：历史传统和结果

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的外交战略受到两条思路的支配：一是领土的不断扩张；二是对海洋的向往。关于前者，论述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对比《大外交》中的解释以及 2005 年国内发表的一些相关论文，学界一般能够认同，边界缺乏依托，没有天然的河流、民族、山脉等疆界直接充当国界，是俄国历史上不断向外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1]第二点则早已尽人皆知。俄国自 18 世纪开始，直到苏联解体为止，其历次对外扩张基本上都可以用以上两点混合加以解释。这两条思路不但影响了俄国二百年间的对外战略，而且导致了两种极为重要的、清晰可辨的现实政策：

(1) 尽量扩展边界，建立缓冲地带，以空间换取在大战来临时国家中心地区得以从容应对的时间。其典型代表即 1939 年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通过对芬兰战争、入侵波兰、侵略罗马尼亚、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等一系列手段，将国界向西推进了 200-300 公里，扩大领土 46 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所谓“东方战线”。这条战线在日后苏德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2) 致力于向关键性的沿海地区扩张，并力图在这些地区夺取重要的出海口和港口。其范例除了耳熟能详的 1700-1721 年北方战争后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以外，还有整个 19 世纪对英、土等国关于黑海海峡的历次斗争。俄土历史上十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的三次全部发生在 19 世纪，而且全部和黑海海峡、君士坦丁堡有关，为此英俄两国屡次交恶。为了这一地区的利益，俄国遭受了 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海洋战略随着俄国势力的扩张，又逐渐放大到了中东和远东地区，其具体目标直接指向波斯湾和中国的大连、旅顺。前者导致 19 世纪英、俄在伊朗、阿富汗的历次战争，后者是日俄冲突和 1905 日俄战争的重要缘由。

理解以上两条思路对于理解斯大林时期苏俄的决策至关重要。与列宁的革命理想主义不同，斯大林是一个秉承传统现实主义的领导人，视领土和军队为至宝。1924 年列宁逝世后，他在 10 年间恢复了列宁时期俄国出于民族自决原则（列宁的毕生信念）放弃的大量海外利益，包括对外蒙古施行控制，干涉中国政局，在中亚驻军，对巴尔干诸国渗透，占领高加索山重要的要塞以及在黑海方向建立优势等。二战的结束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机会来夺取苏联所觊觎的一切周边势力范围，这一范围沿苏联边界展开，西起北欧，东到太平洋，跨越半个地球。“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姆格拉泽(Mugraze)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都讲起过这样一件事：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用图钉把它按在墙上，对周围的人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世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的中国一带画圈，‘长春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2]

也就是说，此时除了南方边界以外，斯大林对苏联的周边局势基本满意。但是这里有一处在日后出现了变动：由于中国内战和政权更替，大连和旅顺的归属问题变得复杂。奉行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不能容忍以昔日沙俄侵华为基础的苏俄在华利益，也就是说，大连和旅顺至少不能像雅尔塔协定那样随意交给苏联使用，即使使用，也应该是出于平等的盟友关系。这一点对于日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又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

2：俄国与斯大林的远东政策

俄国历史上对远东局势的特别关注大概有五次。第一次是 1895 年前后，借用甲午战争、三国干涉还辽之机，从当时的清政府攫取了在中国境内哈尔滨到大连的铁路筑造权、大连港口的租借权，并在旅顺设亚瑟海军基地。第二次是 1904 年前后，在宫廷集团的影响下推行远东扩张，导致对日战争，失败后仅保留了哈尔滨到长春的铁路控制权，丢失了库页岛南部。第三次是 1922-1923 年，即苏俄新生政权与各路反苏军队的战争后期，在内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区与日本、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队都有过军事冲突。第四次是 1938-1939 年，与日本先后在张鼓峰、诺门坎交战，获得胜利，打消了日本的北上念头。第五次即 1945 年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开战，并南下朝鲜半岛。

由于这些复杂的历史因素，斯大林的远东战略思维有着极大的特殊性。一方面，他要考虑从蒋介石中国（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攫取尽量多的利益，尤其是梦寐以求的深水不冻港；一方面，要对战败的日本施加最大程度的影响。在这些考虑中，又留有沙俄势力范围和日俄两次战争的历史记忆。

1945 年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毫不掩饰地要求保证苏联能够使用大连海港，并得到了美英的同意。同年 8 月，针对美国关于日本投降的“总命令第一号”，斯大林于 16 日致电杜鲁门：“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由苏联军队占领；(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第二点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们知道，在 1919-1921 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最后，斯大林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

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3]

根据沈志华教授的分析，斯大林作出以上要求，正是他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接受美国提出的、朝鲜半岛以 38 线为双方分界的原因所在。他希望以在朝鲜的让步，换取日本 38 线以北的领土的占领权。但是杜鲁门委婉地拒绝了这一要求，麦克阿瑟则强硬地表示没有其允许，任何苏联人员不得进入日本。这项政策的失败使斯大林决定把问题暂时搁置，留待以后解决。“这个机会直到 1950 年才出现”。[4]

随后，朝鲜半岛出现了美苏分立的局面。按照《开罗宣言》和雅尔塔会议的精神，朝鲜是应该独立统一的。但是这一点由于美苏双方都致力于在半岛建立一个亲己方的政府而显得非常困难。随着两大国观点日益对立以及在欧洲对抗的逐步升级，两个占领区合作建立统一政府的构想已经逐渐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这种不建政府、各占一边的尴尬局面持续了三年后，南方的大韩民国终于在美国的支持下独立了。不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

苏联帮助朝鲜建国，毫无疑问有自身利益的考虑。新国家的领导人完全是按照苏联人的决定安排的。朝鲜原本的头号人物是抗日民族主义领袖曹晚植，“但他把在朝鲜的苏联军队当做同日本人一样的占领者”。[5]苏联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曹晚植不忠于苏联的政策，有‘民族主义倾向’，于是斯大林决定撤换他。什特科夫推荐了从苏联回国的年仅三十余岁的金日成，斯大林表示同意，说‘朝鲜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需要年轻的领导人。’”[6]于是，金日成担任了作为临时政府的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此时在苏联的扶持下粉墨登场了。

1948 年苏联部分实现了它在朝鲜半岛的目标：建立友善政权，以欧洲为中心，避免在这一地区爆发正面冲突等。而它的对手：西方联盟、尤其是美国，恰恰和它一样实行克制的远东政策。如果事情一直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朝鲜半岛应该是一片安宁，直到今天也不会发生任何战争，但历史很快就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弯。

B: 美国外交战略

1: 历史传统与结果

处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是一个国际政治体系的迟到者。这一点无论是从它建国的时间来讲，还是从它顽固地抱持孤立主义来讲，都很恰当。但是阴错阳差，1917年，它却在理想主义者威尔逊的带领下昂首迈入了世界事务的圈子。尽管战后这位总统心血结晶的“十四点计划”并没有完全得以施行，甚至国会未能批准《凡尔赛和约》，但作为美国外交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以一种使命感向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信念和制度，以及建构一个以道德、民主和舆论而不是以权力和均势为基础的和平世界的理想，从这时起却深深植根于历代美国政治家的头脑中，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不过，当时的美国还太年轻，不懂得：善意的劝说并不时时有效，力量是说服别人时不可或缺的工具。

一战后不久，这个庞然大物又退回到了孤立主义中去，仅仅保持自身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利益，把世界秩序留给英、法两个江河日下的均势政治老手去操控。这样做直接的后果是欧洲局势日益失控，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伟大的罗斯福在美国离战争还很遥远时就预见到了这一点：美国再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并且世界局势的变化也已经越来越影响美国的命运，越来越决定着美国的安全与利益。十年间，他带领着美国走向战争，夺取了胜利，并构筑了一套完全脱胎于“威尔逊主义”的和平框架，这就是著名的“四大警察”制度。根据这一设想，美、英、苏、中作为国际和平与秩序的共同维持者，应通力合作，恢复所有合法的独立国家，在那里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消灭纳粹势力，保证国际合作与和平。在这个新世界里，没有权力政治和均势政治，传统的强权走向消亡，世界应该由众多互相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独立国家组成，国际事务应该交给自由民主的公民和国家去处理。由于它们制度相同，因此和平得以长存，“民主的国家互相不打仗”。它们友好交流，紧密合作，贸易繁荣，并且自愿维系以国际组织为执行者的国际法体系。在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的世界里，没有殖民主义，没有压迫，没有势力范围，战争将成为永远的历史。

这种理想主义的强烈信念只有在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莽撞的、基督教的国家才会产生。它在宗教上源于清教徒“山颠之城”、“上帝选民”、“弥赛亚”的历史观念，在理论上以洛克哲学为根基，承接19世纪英国外交家格莱斯顿的学说，由威尔逊、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完善并形成一套系统的政治哲学。这一信念对美国自身的制度和价值观有着无比的自信（上帝选民），

并认定美国有义务把这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全世界，去解救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人（弥赛亚精神）。究其方式，一是通过自身的完美建设树立“自由世界的灯塔”（山颠之城），吸引他国争相效仿；一是主动与自由的敌人对抗，推翻各种暴政实体（现实主义）。从二战至今，无论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流氓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哨”，都成为美国在其“自由世界与独裁专制世界”的阵营意识中树立起的意识形态的敌人。

在这种思路的支配下，冷战中美国很轻易地把各种政治冲突看成国际化的、两种制度间的对抗。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被美国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扩张。但在拥有强烈反殖民意识的第三世界国家眼里，这些都仅是内战而已，任何外来干涉都会被视为侵略。美国冷战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之一、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著名的记录片《战争迷雾》[7]中以亲身经历阐述了这种误会。90年代，他与当年的越共外长阮元石共同讨论越南战争时，惊讶地发现美国被视为如法国一般的殖民者，而实际上美国人自身干涉的目的却是要从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暴政”中解救越南。美国把越南冲突当作苏联的阴谋，越南却把它当作内战。麦克纳马拉给该节起了一个富有深意的题目：**Belief and seeing are both often wrong.**

我国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宏教授在他的论文《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中精辟地把美国外交思想归纳为三大主题：（1）现实主义；（2）“杰克逊主义”；（3）自由主义。[8]综合美国的历史，这个国家从一战结束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对外行为都是以上三点的混合。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观，时时不忘追求单边利益，并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手段。不同的是，理想化的自由主义是美国与生俱来的信念，而现实主义却是它在冷冰冰的现实中逐渐学到的。由于理想排斥现实，美国人与其英国盟友早在二战期间就发生过冲突。英国首相丘吉尔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顽固派，在1941年发表了《大西洋宪章》（被视为同盟国的政治纲领）后，他坚持这份宪章仅仅适用于被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国家，而罗斯福则认为它适用于整个世界---这就意味着英国所有的殖民地都应该获得独立。罗斯福曾说：

“我深信如果我们要达到稳定和平，就必须让落后国家开发起来。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一方面作战，反抗法西斯奴役，同时不去努力，让全世界人民自落后的殖民政策中解放出来。”[9]

英国内阁表示：“大西洋宪章是针对我们希望救离纳粹暴政的欧洲国家而发，不是用以处

理大英帝国内部事务，也不是用以处理美国与其殖民地，例如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英国人想以美国自身的殖民地封住美国的嘴。然而他们“却没有了解，事实上美国已经准备把它宣扬的这套理想付诸实行，一俟战争结束就要让它唯一的殖民地菲律宾独立。”[10]

与这种想法相矛盾的是，战后在全世界保持最大势力范围的恰恰是美国，并且它资助在大部分殖民地人民眼里属于侵略国的英、法等欧洲国家。这是美国历来外交政策的最大悖论：一方面深信自由主义的理想是正确的，因而坚定不移地向外推行；一方面为了推行这种“正确”而做出恰恰是“错误”的事，如海外驻军、对外扩展军事势力等。在他们看来，只要还有与自由世界相背的势力，美国就不得不使用强力来推行自己的主张。

此外，美国自身的决策机制又使得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不同环境下的外交政策体现出巨大差别，有时它们之间甚至互相矛盾、自我推翻：麦金莱占领菲律宾，罗斯福却决定让它独立；老罗斯福与威尔逊先后担任总统，但他们的思想格格不入；克林顿与小布什用不同的办法捍卫美国的地位，而其外在表现迥然相异。以上种种造成美国外交政策的极大复杂性---这要求我们不得不对之条分缕析，具体分析，而不是“一言以蔽之”。

总之，在罗斯福的领导下，二战结束前夕的美国准备用理想化的自由主义来修复和规整全世界。这套理想并没有因罗斯福的去世而搁浅，而是交给了他杰出的继任者杜鲁门。这位在中国的儿歌里被极力讽刺的总统，将带领美国走向现实，走向一个外交政策的新道路---遏制战略。

2：美国的政策与东亚局势

作为美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位总统，杜鲁门用自己的话为自己的外交思想做出了经典的注解。1961年，他在堪萨斯城对来访的基辛格说道：“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助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对比这句话与威尔逊所说的“有时人们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恰恰正是从这一点，我认定我是个美国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想主义国家”[12]，有着何其相似的使命感和道德优越感。）这句话当然主要是指德国和日本。对于苏联这个主要对手，1961年距离美国的胜利还很遥远。

当 1945 年罗斯福去世时，副总统杜鲁门无疑是以一种谨慎的态度步入总统办公室的。他从未参与过重大的外交决策，背负着其前任巨大个人声望带来的包袱，并且很快发现他必须在地球两端和共产主义苏联争夺势力范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与罗斯福不同，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视为一丘之貉，并且鲜有退让。还在任职议员时他就说过：“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他们都是不守信诺的人。”^[13]因此，1945 年日本溃败时，他严格地坚持美国单方面占领日本，不允许苏联涉足，并在朝鲜半岛为“自由世界”争取到了 38 线以南的领土。

1945 年美国为何一定要在朝鲜半岛以 38 线与苏联为界，为何一定要夺取半个半岛的势力范围，一直是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疑题。传统的说法包括建立东亚桥头堡、巩固日本等等，这种从美国推行对外扩张这一猜想出发所做的解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又很难经得起推敲。美国在当时并没有巩固东亚进而向内陆侵犯的任何打算，而且当时中国仍然掌握在国民党手里，美国为什么、有什么必要专门在朝鲜建立“桥头堡”呢？当时美国也并不知道自己会单独占领日本达半个世纪之久，并不可能预见冷战的到来和美苏在全世界的冲突，更没有理由认为将来日朝或者日苏间的任何冲突与美国的利益直接相关，因此，似乎也谈不上“巩固日本”。这一问题可能很难有定论，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战后同盟各方分派占领区的习惯性思维和美国政府、尤其是总统杜鲁门对苏联的不信任所导致的。同时，与在欧洲的艾森豪威尔（他主动放弃美军越出雅尔塔会议商定分界线的部分领土，被丘吉尔指为“不懂政治”）截然相反，东亚美军的实际指挥者麦克阿瑟是一个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不愿“为共产主义留下一丝空间”，他的意见在从占领南朝鲜到日后扩大朝鲜战争的各方面事务中毫无疑问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军事占领的分界线起初并没有被看作是美苏的敌对线，国际集体和平仍然是主要的目标。为此，不但召开了波茨坦会议，还以此为基础召开了各国外长会议。美国的政策相对还是明确的：承认苏联已经建立的势力范围，承诺未来它在这些范围内的利益优势，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与苏联寻求合作，共同解决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各二战被侵略国的国内问题，以“四大警察”设想为蓝图共同解决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同时防止共产党势力的进一步扩大。

一方面由于视苏联为盟友，因而并未考虑以军事和强力手段来实施这套理想。另一方面，就自身的国力和国内舆论而言，在战后并没有维持大量海外利益、驻扎大量军队的需要（1946年国会通过法案，要求把多达 1200 万人的美国军队尽早缩小到 100 多万），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在政治上积极干预国际事务的同时，其硬实力实际上处于大幅收缩阶段。英国由于其国力长期被丘吉尔粉饰，因而被寄予期望在欧洲担当维持秩序的重要任务。1946 年，除了至关重要的日本、德国等地区以外，美军已经开始循序撤离全球的各占领区。即使在日本，驻军也大大减少，并且更多地使用新兵。1948 年美苏和解已经成为不可能时，美国扶植了李承晚的大韩民国政府，帮助建立了其武装力量。由于担心稍有力量韩国就会抑制不住向北进攻的欲望，为其建立的军队只拥有略强于警察的作战能力。到 1949 年，美国军队已经完全从朝鲜半岛撤出。

较为特别是中国。由于国民党政府被视为重要的盟友和四大警察的一员，却在战后陷入了针对共产党的内战，美国不得不对其进行了有原则的支援，即不派任何战斗部队、而只帮助运输。1949 年中国大陆改旗易帜使美国心灰意懒，不愿再为蒋介石火中取栗。加之当时美苏对抗的关键区域是欧洲，因而，1949 年为止美国在东亚大陆实际上执行了撤离和撒手的政策。1950 年 1 月 12 日，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展示了美国在东亚的防卫圈，明确把韩国、台湾排除在外，让当地的政府听天由命。防卫图的确表达了美国当时的思路，但也给了苏联方面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这一信息对朝鲜战争爆发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C：美苏走向对抗和朝鲜战争爆发

1：两种和平观与冷战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命运掌握于美、苏、英三大国手中。这三国如果像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上各国的贵族王侯一样有一套统一的价值观，那么战后世界问题的处理就会比历史现实果断得多。不巧的是，美国与英、苏恰恰抱持着完全不同的和平观念。

英国和苏联这样的传统大国，历来奉行现实主义。斯大林和丘吉尔从自身政治哲学出发，根本不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能携手共建一个新世界。他们把对方当作无可挽回的大敌，认为冲突迟早来临，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巩固自身的谈判筹码。在他们眼中，二战后的世界与过往战争的结果是一样的：谁占领的土地谁说了算，最后双方通过力量博弈和谈判构筑一个势力均衡的体系以达到和平。美国的想法与之天差地远，如前所述，它的对外政策带有极大的

理想化、道德化的成分，视传统的均势政治、势力范围如洪水猛兽，并认为战时盟国必须协力以“四大警察”为蓝本构建一个威尔逊式的新世界。参加 1945 年波茨坦会议的美国代表手里都有一份国务院的简报资料，这份资料提示：“势力范围代表最纯粹的权力政治，带来各式各样的不利。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去除让各国觉得需要以此势力范围建立其安全的原因，而不是协助一国建立实力去对付另一国。”[14]这套哲学如果说在信仰基督教的英国人面前还可以得到些许理解，那么在唯物主义的苏联人面前则一律被看作别有所图的诡计。斯大林丝毫不认为所谓“民主和平的世界”有何意义，在他看来，国际政治除领土和军队外别无其他实质内容，再加上他坚定信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使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终究水火不容，因此大搞权力政治的旧套路，终与美国渐行渐远，以至反目。英国被夹在中间，因国力不济不得不偶尔与美国唱和两句，实际上却对美国的幼稚深不以为然。

这样哲学层面的根本不同放诸一个个具体事件，只能带来互相猜疑和敌对的不断升级。甚至在美英两国之间，也存在巨大分歧。早在战争结束前，美英和苏联即对波兰政府的组成发生争执。波兰临时政府是在苏联支持下组建的，成员主要是共产主义信徒。美、英分别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出发，坚持临时政府必须在真正民选的基础上进行人员变更。苏联视波兰为自身势力范围，对美英的“干涉”满腹狐疑，阳奉阴违。波兰是战前西方的盟国，与英国外交关系久远，英苏在这一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大。1945 年 5 月，杜鲁门分派两位特使前去会见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调停，出使伦敦的戴维斯在听取了丘吉尔关于压制苏联的一整套设想后以讽刺的口吻反问是否“他和英国都后悔没有支持希特勒，因为就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主张的这套说法正是希特勒和戈培尔在过去四年一再的主张，希望能打破盟国团结，分享征服成果。”[15]

美国种种理想主义的努力在没有合作伙伴的情况下收效甚微。随着时间推移，双方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国内问题上达成谅解逐渐变得不可能。苏联在其军队控制的每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扶植起傀儡政权。莫洛托夫发表声明：二战时期法西斯曾经通过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入侵苏联，苏联在这一地区建立友好政府，保卫自身安全，是非常合理的事。但美国方面并不这么看，时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哈里曼发回报告说：“我担心斯大林现在不会，将来也决不会了解我们为何把一个‘自由波兰’当作原则问题。他作为现实主义者很难理解我们对抽象原则的信仰。他很难了解我们为何会干预苏联的对波兰政策，波兰攸关俄国的安全。”[16]

在 1947 年以前，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基本有三个原则：“(1)继续与西方大国的合作，(2)防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欧集团的出现，(3)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17]但他没有意识到，他在东欧的种种做法虽然没有丝毫损及美国的军事安全，却已经使美国忍无可忍。1945 年到 1947 年初不到两年时间，他控制整个东欧，在德国与西方对抗，支持希腊的共产主义革命，向土耳其提出俄罗斯传统的海峡地区利益要求，要求参与瓜分意大利殖民地，野心较 1939 年与希特勒合作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意孤行地执行着现实权力政治。

其实，当时苏联的国力与其强硬的姿态是很不相符的。在二战中苏联死亡 2000 万人以上，莫斯科以西化作一片焦土，国内经济急需恢复，理论上讲无力与工业完备、垄断核武器的美国全面抗衡。但斯大林出于策略需要，越是脆弱就越是装作咄咄逼人，甚至凭借强大的常规兵力，暗示必要时苏联可直趋英吉利海峡，以此威慑西方。结果，苏联越是强硬，美国人的理想方案就越是落空，苏联的实力就越被夸大，西方对苏联的疑惧就越强，到最后西方竟看起来处于极大的弱势，必须处处戒备苏共的进犯。

这种情况导致在 1946-1947 年，西方阵营中大量的现实主义理论和思想开始流行，逐渐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態度。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乔治·凯南的《八千字电报》（几乎与诺维科夫的电脑同时，这份电报阐述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认为美国有一个“广泛的扩张计划”）以及他后来以 X 为笔名发表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以凯南为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者对战后苏联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俄罗斯帝国的侵略传统、苏联共产党的制度根源等多个角度论证了对外侵略扩张和敌对是苏联本质决定的、不可改变的特点。这一整套理论在美国政界影响极大，加之苏联日益大胆的扩张行为，终于使美国决策层放弃了理想世界的美梦。

到 1947 年 3 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政府的论调与战后初期已经完全不同。杜鲁门在演说中提出两种生活方式的对比：

“第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多数人的意志，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却是以少数人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压制，控制着报章和电台，操控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18]

这篇日后以“杜鲁门主义”而闻名的演讲揭开了冷战的序幕，其内容则完全是用新式的道德原则来进行旧式的势力划分，重新举起了权力政治的大旗。用国务卿马歇尔的话说：“任何政府、政党或团体，试图让人间沦于永远悲惨以便借以获取政治或其他利益者，将遭到美国的反对。”[19]美国将把一项原则作为对外战略的核心，那就是“保护自由”。毫无疑问，这种战略的主要敌人就是苏联及其盟国。

至此，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理想主义而参与到了英国的现实主义中，祭起“遏制战略”，领导着西方阵营与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展开对抗。两大阵营奉行的哲学都声称要解放全人类，塑造和平与自由，但他们之间互相的不信任使世界走上均势政治的老路，造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一个全球性的对峙状态：冷战。

2：欧洲对峙

欧洲无论因其历史地位还是现实利益，都必然成为美苏对抗的中心。美国巩固其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就是“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最初的对象包括所有欧洲国家——甚至苏联也在内，但双方的谈判在6月份就破裂了。由于把马歇尔计划看作是杜鲁门主义的延伸（两者提出仅相隔两个月）和拼凑西方集团的努力，斯大林强令他的所有盟国一并拒绝这一计划，接着又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经济互助委员会，在法理上彻底统辖了东欧。1947年9月，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法国和意大利共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在波兰的什卡腊尔斯卡—波伦巴召开各党代表大会。“会议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布世界已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宣言认为，‘杜鲁门——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计划的欧洲一章而已。’”[20]这差不多就是杜鲁门主义的东方版。

1948年，西方六国召开会议，决定单方面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建立一个政治实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此举造成苏联退出对德管制委员会。为了给新国家铺设经济基础，1948年6月西方又单方面在占领区实行金融货币改革，实际上在经济上把西方占领区独立起来了。作为报复，

斯大林封闭了柏林西区的陆上交通，引发了持续近一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

同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重大事件。1948 年 2 月，已经在全民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突然发动政变，解散了议会和联合政府，建立了一党专政。“捷克共和国国父之子，非共产党籍的外交部长马萨里克（Masaryk）几乎可以肯定被共产党人亲手由办公室窗口推出，坠楼摔死。”[21]

这次残酷的政变刺激西方国家于同年签定了布鲁塞尔公约，反对“任何推翻民主政府的行为”。到 1949 年，美国主导建立了北约组织。这是美国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同盟，它把整个西欧置于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伞下。

长期以来我国教科书指责西方国家分裂德国和朝鲜。从实际情况来讲，单方面政权建立的确都是自西方始，但这完全是两大阵营互不相让的结果，没有理由把责任完全推向某一方。两种制度的对抗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达到了顶峰。如前所述，美国在东亚采取了收缩战略，而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遏制战略定义极其模糊，尤其在手段上没有清楚界定。美国究竟追求什么样的具体目标，对“共产主义”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军事力量，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其他方式，不但美国官方，甚至该战略的提出者凯南均未给出过具体解释。凯南在日后声称，他心目中的遏制战略不应使用军事力量，但却没有说明不使用军事力量如何保证遏制的达成。美国政策道德化这一点导致美国对任何违反自身道德标准的事件都看得极为严重，当作原则问题对待。1950 年 4 月，国家安全会议六十八号文件（NSC68）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冷战策略进行了阐述，其中不仅认为世界正处于以美苏为中心的“历史性的权利分配”进程中，苏联为了支配欧亚大陆“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或毁灭美国的完整的活力”，“冷战实际上是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绝续的真正的战争”，美国只能“凭着良知和毅力，作出生死攸关的新决定”，还特别写道：

“自由体制在任何地方失败就是处处皆失败。捷克覆亡，我们所遭受的震撼决不能以捷克对我们在物质上有何重要去加以衡量。就物质意义而言，捷克的能量早已在苏联支配下。但是当捷克体制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时，也就是在这个无形的价值指标上，我们测度到的损失，远比我们业已遭受的物质损失，伤害大多了。”[22]

这样的文字看来未免空泛，但对当时道德意识浓重的美国人却是自然而然的。这份文件可惜无法被苏联官方了解透彻，否则也许不会出现苏联日后对朝鲜半岛问题的错判。1950 年 1 月艾奇逊公布的美国东亚防卫圈固然说明了美国硬实力覆盖的区域，但这不表示美国在道德上对韩国和台湾的前途漠不关心。就在 NSC68 文件发表的同时，金日成已经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进入了战争前的最后准备阶段。

3：斯大林变卦，朝鲜战争爆发

朝鲜，作为一个民族，本身就应该统一为一个国家，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趋势。1948 年南北两个政权建立后，双方都自然而然地整军顿武，希望在和平解决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有朝一日能够达到武力统一。但是就其政治背景来说，双方都必须得到各自老大哥的支持才有可能最终实现目标。因此，尽管 1949 年整年中双方在 38 度线武装冲突不断，但由于美、苏在远东克制的政策，大规模的战争始终没有爆发。

当时，双方都有各自的武力统一计划，并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即付诸实施。由于南方政权的政治基础和工作效率很差，北方实际上掌握了优势。金日成一直对军事胜利充满信心，1949 年 9 月 3 日，金日成通过苏联代办顿金（Tunkin）向斯大林报告韩国的军事计划，并“要求准许对韩国发动进攻，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战线”[23]并在 9 月 12 日与顿金的会晤中表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24]当月苏共中央经过讨论，决定不允许金日成发动进攻，并要求朝方进一步加强人民军实力，在南方扩大游击队和党组织等。同年底，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多次向苏共领导人提出武力统一的要求，始终未能得到满足。可以说，整个 1949 年，金日成是在苏联方面的强行压制下才没有实行自身的战争计划。

同样的，韩国方面李承晚政府也早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949 年 4 月，李承晚在给韩国驻联合国大使赵炳玉的信中说：“我认为，就这种形势，你应该极其秘密地与联合国和美

国高级官员开始会谈。为了统一，除了缺乏武器和弹药外，我们在其他方面已经准备就绪。”7月，李承晚在对记者的讲话中宣称：“占领北朝鲜就可以实现统一。”10月，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要不流血，统一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实现了也不可能长久。”10月31日，他在美国圣福尔号巡洋舰上发表演说，表示“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25]。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韩国也没有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

在这里，我们不妨稍微讨论一下有关“朝鲜战争谁开的第一枪”问题。如果说早先史学界尚对这一问题尚持有争论，那么随着第一手档案材料的不断公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北朝鲜实施其军事进攻计划为肇始，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此处仅举较为典型的一项材料，6月26日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汇报战争进展，电报写着：

“谨此报告朝鲜人民军军事行动的准备和进程。

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

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У’的命令。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时40分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20-40分钟，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

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 12 个小时以后才开始。”[26]

凡此种档案材料，比比皆是。大量材料说明，北朝鲜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

那么，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对北朝鲜的行为给以盖棺定论了呢？笔者认为不然。

第一，“第一枪”这一说法本身就存在问题。战争爆发前，38 线附近一直持续军事冲突，在边境上枪炮可以说从未间断，且南朝鲜确实占领了北朝鲜少量领土。这样，北朝鲜方面把军事计划形容为“反攻”，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那么，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武装冲突中，究竟哪一枪是“第一枪”，是引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恐怕没人能够说清。

第二，即使认定北朝鲜方面首先实施了大规模进攻计划，也没有必要给予过分苛责。因为就当时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来看，即使北方军队不进攻，南方军队也迟早要进攻。双方在战争爆发前都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始终处于互相仇视、随时准备武力统一的状态下。从策略角度讲，与其坐等对方进攻，不如主动进攻对方，也是合理的。可以说，在这种互相威胁、互相敌对的、随时可能开战的形势下，讨论谁开了“第一枪”，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和标准选择的问题，而在国际法和国际伦理方面评判的价值并不大。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格外关注，即苏联方面态度的突然变化，是朝鲜得以发动战争的重要条件之一。整个 1949 年，尽管金日成反复要求，斯大林始终没有同意他发动进攻。按照这种克制的状态发展下去，北朝鲜是不可能开战的。但是到了 1950 年 1 月 30 日，斯大林突然改变了态度。他在听取了什特科夫关于前不久一个宴会上金日成言谈的报告后，亲自回电说：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好，不能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材料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同意为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开放绿灯。

[27]

那么，从 1949 年到 1950 年 1 月底，斯大林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呢？这期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促成了这一改变呢？这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

1949 年 12 月到 1950 年 2 月，中国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由于中苏双方存在重大利益矛盾，毛泽东起初受到了极大冷遇。而这个重大利益矛盾，就是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根据 1945 年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实际上控制了大连和长春铁路，以及相关的一些利益。这些利益符合俄国长期以来的远东战略，其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即保持通向大洋的深水不冻港。而毛泽东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坚决要求重新签定新的条约，并尊重新中国的国家主权，把这些利益归还给中国。对此，斯大林极为不悦，谈判在 1949 年 12 月底即陷入僵局。第二年初，由于得知英国、缅甸、印度、英联邦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担心中国与西方阵营和解，以及其他复杂的原因，斯大林开始让步，并于 1950 年 1 月与毛泽东、周恩来就东北问题基本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至迟到 1952 年，苏联将丧失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利益。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沈志华教授精彩地分析道：“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是被迫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而这就意味着苏联在可以预见的短短两三年内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在远东的主要权益，因此，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

用。.....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28]维护苏联在远东的利益，这是斯大林改变对金日成战争计划的态度的原因之一。

但是，还不能简单地讲，斯大林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仅仅就是因为这一点而改变了想法。放眼 1948-1950 年苏联的远东政策，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由守转攻的总过程。首先针对中国内部问题，从 1945 年的“不准革命”转到了 1948 年的“不顾一切帮助中国同志”，并在 1949 年 7 月刘少奇访苏时提出了“革命分工”。其次在朝鲜问题上，从 1945 年大量拆除当地工业设备，转到 1948 年帮助金日成建立政权，大量提供经济援助等。1949 年新中国建立，使东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对苏联大为有利的变化。刚刚在柏林危机中未能压服西方的斯大林，恐怕正需要一个在欧洲以外地区能够帮助自己分散美国力量的盟友。因此，抛开雅尔塔协定，与中国正式结盟，并在远东转入进攻，牵制美国，成为一项非常有利而且合理的政策。[29]

但是，仅仅做以上考虑，还不能完全保证战争的胜利。斯大林还要考虑两个问题：1、一旦战争爆发，美国是否会干涉。2、万一美国干涉，如何应对，既不使美苏正面对抗，又能保证苏联不受侵害。

关于第一个问题，金日成曾多次向斯大林保证，北方的迅速胜利将使美国来不及采取干涉行动。1950 年 1 月艾奇逊的发言把韩国从美国防卫圈中划了出去，很大程度上促使斯大林相信美国将不会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做出激烈反应——不久前它不是也没有干涉中国大陆的内战吗？连中国这样重要的地区美国人都没有出兵，有什么理由认为美国会在意小小的韩国呢？1950 年 4 月，金日成再次访问莫斯科，在这一问题上又提出四点理由：“(1)北朝鲜将在三天内取得军事胜利；(2)将有 20 万南朝鲜共产党员举行起义；(3)南朝鲜游击队将支援人民军作战；(4)美国对此没有时间进行准备。”[30]这一系列因素（其中艾奇逊的发言极为关键）使斯大林相信，美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将保持克制。

不过，万一美国真的干涉，该如何应对呢？斯大林对这一难题的解决方式是：把担子放在新中国的肩上。对这个新的盟友，斯大林既友好又感到不信任，始终希望把中国纳入苏联的战

略轨道。一方面，以中国作为前哨，苏联可以避免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朝鲜问题上借用中国的力量，减轻苏联的负担，这也可以看作是苏联在中苏新条约上让步所获得的补偿。因此，在朝鲜开战过程中，斯大林反复强调中方态度的重要性，多次要求金日成与中国同志商议。迟至 1950 年 4 月，即他已经同意帮助金日成发动战争，双方已经在莫斯科进行秘密会谈时，他仍向后者强调：“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31]如果中国同意为朝鲜充当后援，为苏联火中取栗，对苏联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朝鲜政策的变化一无所知。从自身利益出发，新中国并不希望在自身的东北疆出现紧张局势。一方面，国内战争的主要战线此时尚在南方，几十万国民党残余部队仍未消灭，台湾等重要岛屿尚未解放，东北地区当时是全国驻军最少的地区；另一方面，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国家急需回到经济建设的道路上，军队需要复员参加生产。因此，中国一直不主张金日成主动进攻韩国，并且在这一点上与苏联原先的态度是一致的。对于斯大林的变卦，中方毫不知情。早在 1949 年 10 月，双方曾经就朝鲜问题交换过意见。中方通报苏方，毛泽东在 4 月份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中国时，曾劝说对方不要主动进攻，斯大林复电表示中方的意见“完全正确”。1950 年 1 月，就在中苏谈判进入尾声，中国领导人尚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向朝鲜发出了前文提到的准备帮助金日成的电报，但对毛泽东等人却只字未提。

这样隐瞒的结果是，1950 年 5 月，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访问中国，并在会谈中表示苏联已经决定支持他时，会谈在当晚就中断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莫斯科报告说：“13 日（即中朝会谈当天）晚 23 时 30 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即斯大林）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32]可见，在此之前，中方从未了解苏方态度的转变。对于金日成的说法，中方并不完全相信，急于向莫斯科方面求证。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向中国透露了他的新计划。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33]在这种木已成舟情况下，毛泽东也就很难再强行反对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按照计划展开对南方的全面进攻，朝鲜战争爆发。

D：战争扩大

1：美国参战

朝鲜战争爆发于6月25日凌晨，而美国政府则于当晚就做出了三项决定。每一项决定都很值得讨论，互相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第一项：允许美国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使用一切武器弹药支援韩国军队；第二项：在撤退美国人员的同时，允许美国远东海、空军支援韩国部队；第三项：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一切对台湾的进攻。从时间上看，当晚不到12点做出的决策，即使把全球时差算在内，距离战争爆发时间也只是刚刚超过24小时。如此快速地做出影响重大的决定，其道理何在呢？为什么美国如此快速地决定插手？为什么一开始仅仅使用海空军？为什么要把台湾海峡牵扯在内？

尤其是第三个问题，是日后中国出兵朝鲜时，中方动员己方人员的重要依据，是社会主义阵营日后长期指责美国施行侵略的关键原因之一，也是一度在史学界颇具争议的问题。王树增在《远东 朝鲜战争》中也提出：“一场发生在朝鲜的战争，与中国台湾有什么关系？”的确，如果孤立地看待朝鲜问题、中国问题、欧洲问题，如果把一个国家的事务永远只摆在一个国家内部看，如果单单把美军进入台湾看作中美之间的事，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事，那么，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问题在于，如果把视角拉到全球，用两大阵营对抗的目光来看，美军进入台湾海峡，却是“合情合理”的。

朝鲜战争，在二战后日益紧张的世界局势中，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单看战争本身，似乎是一个未完成统一国家展开的内部争斗。但由于国际局势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已经划分为敌对的两派，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由单单一国进行决策，或者把任何事件交给单单一国去处理，一个国家的事一定会上升为一个阵营的事，国家间的对抗，毫无疑问就是阵营间的对抗。如果朝鲜战争是1945年后美苏之间第一次间接的较量，也许美国还不会冒与苏联直接冲突的危险

迅速插手。但是当美国领导人经历了苏联控制东欧、柏林封锁、捷克斯洛伐克政变、共产党控制中国大陆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每一项都让仇视共产主义的美国人觉得难以忍受）后，再面对一场朝鲜战争，他们就毫不费力地把它解读为一场共产主义向全球进攻的前哨战了。由于此前美国决策层内部已经到处弥漫着危机意识，战争爆发后当局“几乎立刻断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否则‘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指德国入侵捷克）。美军方的反应同样强烈。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军几乎没有打过局部战争，美军头脑中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这点在《大外交》中也有所阐述，美国当时根本没有想过战争如果不是世界大战而是局部战争该如何应对）。所以他们立即‘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苏联‘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显然，美国决策层当时根本无法、也不愿意去理解，朝鲜战争在最初阶段本质上是一场内战。他们在战争爆发后举行的第一次高层会议上便达成共识，即这是苏联‘企图违反协议把朝鲜搞到手’，‘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美国必须坚决予以反击。”[34]如果说，之前所有“共产主义扩张”还都停留在建立国内一党专政（波兰）、政变（捷克）、内战（中国）这种国界内的行为上，因而还不足以激起战争，那么朝鲜战争则是“共产主义扩张”第一次通过一个独立国家对另一个独立国家的武装侵略来进行，受到了特殊对待。杜鲁门在后来“联合国军”进入朝鲜时发表声明称：

“对韩国的攻击已经不容置疑，这表现出共产主义已超越用颠覆手法征服独立国家，今后将运用武装侵略和战争的手段，它违背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颁布的命令。”[35]

斯大林相信了美国把韩国排除在其防卫圈外的说法，但却没有了解那只是地缘政治上的划分，而不是美国“道义原则”的划分。他以为美国在默许中国大陆改旗易帜之后，不会为了并不重要的韩国大动干戈。6月底美国做出的种种激烈反应着实让斯大林及其顾问吃了一惊，“他们显然没有了解到，美国决策人士对美方一再宣称，抵抗共产党侵略是道义责任的说法，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战略分析。……美国方面以原则来看待这件事，它比较不关切韩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已公开做出表示，却十分重视听任共产党侵略行径不加阻挡的象征意义。”[36]

多年后，杜鲁门回顾朝鲜战争时说道：“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对一个自由国家实行武装侵略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们向大家宣告，我们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

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末，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37]

当然，如果说美国此时的干预完全没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也是很狭隘的。但需要注意，这种考虑，恰恰是被朝战激发起来的。没有朝鲜战争，美国丝毫不必担心它在日本的地位。由于此前双方的主要对抗都发生在欧洲，美国根本没有料到远东会出现大规模战争。朝鲜军队南下后，一个可预见的事实是，苏联将控制整个半岛，而下一步苏军就随时可以在面向大洋的海军掩护下向日本进攻，那时美军将被迫防守漫长的日本海岸线。与其这样，还不如把战线推到朝鲜半岛为好。

杜鲁门主义、道义原则再加地缘政治，“自由世界”必须在每个地方抵抗“共产主义扩张”的指导原则和对共产主义全球进攻的估计，使美国把台湾海峡当作“自由世界”的边界之一保护了起来，同时还像印度支那地区增加了兵力。作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必须共同得到保障，这就是朝鲜战争与台湾海峡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今天，史学研究已经证明（实际上仅从当时苏联的国力就完全可以判断出），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根本不存在什么全球扩张计划。

战争爆发之初，一方面因为形势还不明朗，韩国方面是胜是败，是否需要美国珍贵的陆军兵力“亲自”出手尚不确定。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全球陆军兵力的削减（仅不到 60 万人）和对远东防务的相对轻视，美军在日本的驻军单位很多并不满员，而且有大量新兵，所以一开始美国的干涉仅仅使用了海、空军。但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一位整日祈祷共产主义进攻，以求消灭所有共产主义势力的狂热者---对此极不满意。从战争一爆发，他就屡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参战。地面部队参战，意味着美国正式与朝鲜进入战争状态，这是一个牵扯极大的问题。但在麦克阿瑟眼里，战争和反共重于一切。凭借二战中建立起的巨大声望，他对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态度生硬，我行我素。6 月 30 日未经同意即出访台湾，使中国政府更加确定地把美国干涉朝鲜战争与中国内战、反攻大陆等敏感问题联系起来，引起杜鲁门的极大不满。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麦克阿瑟的种种狂妄行为，为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

27 日麦克阿瑟派遣地面部队的要求并没有马上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意。但到了 28 日，即汉城失守、韩国军队已经开始崩溃的时候，美国方面终于认定：除非美国出兵，否则共产党必然控制朝鲜半岛。当天深夜，麦克阿瑟再次催促联席会议派两个陆军师进入朝鲜，并提出运送蒋介石部队参战。29 日上午，杜鲁门与联席会议做出决定，同意派遣两个陆军师，但否决了蒋军参战的提议。

否决第二项提议，至少说明美国方面还不想把这一事件完全和中国内战联系起来，不想把美国对韩国的帮助变成看起来像是间接帮助国民党通过东北反攻大陆的计划，而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仅被作为一种防御策略。但实际上，进驻海峡本身，再加上麦克阿瑟等人对台湾的访问，已经足以使新中国上上下下认定美国有助蒋反攻的企图了。

为了让自身干涉具有合法性，美国决定借用联合国。在 6 月 27 日认定朝鲜为侵略者后，7 月 7 日安理会决定组建联合国军干涉朝鲜战争。由于斯大林早先玩弄的外交手腕（让新中国领导人提出国民党的联合国代表席位非法，然后对这一提案表示支持，否定“资本主义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命令苏联代表不出席有国民党政府参加的安理会会议），7 月 7 日安理会突然讨论干预朝鲜问题时，苏联代表同过去几个月一样没有出场。斯大林命令实行否决权的电报是在组建联合国军进入朝鲜作战的决议做出之后，才到达苏联代表手中的。结果，美国方面的干预就变成了国际合法机构的干预。

此后的战争进程已是众所周知。8 月初联合国军被压缩在釜山一隅之地，双方开始僵持。9 月 15 日，麦克阿瑟指挥了仁川登陆，形势逆转。9 月下旬，联合国军在南部和中部均展开进攻，朝鲜人民军开始溃败。30 日，韩国军队越过 38 线。

韩军进入朝鲜领土的第二天---1950 年 10 月 1 日，正是新中国建立一周年的纪念日，所有重要的国家领导人齐集天安门参加了盛大庆典。此时此刻，敌国正在向鸭绿江挺进，历史把一项艰难的抉择推到了这些巨人面前。

2：中国参战

斯大林一直希望淡化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地位，以减少美国进行干预的口实。战争爆发后，他召回了所有朝鲜前线部队的苏联顾问，并向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

控我们参与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38]到了6月底美国进行干预时，斯大林就开始盘算如何把中国拖入战争了。7月2日，罗申向斯大林报告他与周恩来的会谈情况。

周恩来抱怨苏、朝对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估计不足，转告毛泽东的建议，认为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应在仁川建立一道防线。最后表示，中国已经在沈阳附近集结了三个军12万人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38线，中国军队将假扮朝鲜军队入朝作战，并询问苏联是否能够提供空中支援。斯大林对此积极地回复：“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39]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苏对朝军与美军作战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均认为朝鲜打不过美国，美军迟早要打过三八线，威胁朝鲜本身。因此，无论是中方还是苏方，都在为这一可能出现的结果做至少是心理上的准备，一个准备出动陆军，一个准备出动空军。同时，双方在这里也都玩弄了外交技巧。苏联在探听中国的态度，而周恩来则欺骗了罗申。中国做出在东北集结作战部队，最早也是7月7日第一次国防会议的事。7月2日为止，中国在东北的正规野战部队只有第42军而已，其兵力远不足12万人，并且正在垦荒，部分部队还在进行复员工作，根本不在备战状态。周恩来是在用这种方式，试探苏联对中国参战的态度。

为了应对东北疆的紧张局势，预先防范美军可能打回38线以北的情况，7月7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保卫国防第一次会议”，当时在中央任职的重要军政领导全部出席。7月13日，中央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动用此前已被预编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预备队的第十三兵团、下属第38、39、40军，联合原驻东北的第42军，组成“东北边防军”，邓华调任司令员。至7月底，当朝鲜军队在战争中仍保持着南进势头、向日本海海岸挤压联合国军时，东北边防军已在中朝边境集结完毕。

克服部队解甲归田的惯性心理，征召刚刚复员的老兵归队，丢下就快收获的地方农田，让一支大军跋涉几千里驻扎在遥远的边境，这样克服种种难以言状的困难而完成的战略决策，在日后看来，无疑是很有远见的。

半岛上的战争，在8月4日联合国军釜山防线稳定后进入僵持阶段。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朝鲜军队的败局就较为明显了。此时的问题是，未来美军会不会越过38线？如果越过，中国是否会出兵呢？为了以防万一，“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

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40]10月1日，中国方面接到斯大林的信中说：“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41]就在同一天，斯大林在给金日成的信中说：“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42]在关键时刻，斯大林按照计划把责任推给了中国。

从中国方面讲，基本上已经确定，如果美军越线，中国肯定出兵。但是，为了尽量避免参战，中国仍然在事先提出了多项措辞严厉的声明。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Panikar)说：“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但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9月30日，周恩来发表重要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怕反抗侵略的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企图把中国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杀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这篇演讲所针对的，正是当时还在讨论是否让军队越过 38 线的联合国大会及其主导者——美国。

美国此时已经进入了一种连胜后的异常的自信状态。尽管这样一个道理显而易见，即中国决不会容忍在鸭绿江出现敌对部队，正如同美国不会允许与墨西哥交界的格兰德河出现敌对军队一样，但当时的美国情报部门和决策人员仍然倾向于判定中国只是进行外交恫吓，不可能真的出兵。9月27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相关议案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知麦克阿瑟可以越过 38 线。10月1日，已经骄狂之极的麦克阿瑟向金日成和朝鲜军队发出要求投降的敦促书。同一天，金日成向中国政府写信，请求武力支援。

在出兵朝鲜问题上，中国政府经历了繁复的内部争论和艰难的对苏谈判，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难以抉择的问题。在接到斯大林 10月1日的信后，中共中央分别于当晚、10月2日、4日和5日召开四次会议，专门讨论出兵问题。其中，2日的会议已经决定由彭德怀担任

志愿军总司令，因此彭德怀 4 日就到达北京参加了当天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 日又在会议上做了支持出兵的慷慨激昂的演讲。在这四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无论是否支持出兵，都列举出了充足的依据。

的确，就当时的形势来讲，中国出兵的不利条件简直是数不清的。国内民生凋敝、失业众多、物价高涨、运输系统破坏严重、人民流离失所、工业产值仅相当于战前最好水平的 30%、国家财政负担尤其是军费过重，可以说，一个完整健康的国家必备的各种要素，这时没有任何一项被建立起来。军队方面武器装备较差、补给缺乏，又没有海、空军的支援，看起来各方面都无法和美军相匹敌。就中国的国情和国力，不参战是完全有道理的。

但无论作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讲，参战又是当仁不让的选择。毛泽东出于革命的热情和气概，认为不能在这种关键时刻向帝国主义示弱，丢弃盟友不顾。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如果让敌军压到鸭绿江边，丰满水电站的电力将被牵制，影响整个东北工业基地的生产。鸭绿江一千公里的边界上将不得不维持大规模防卫部队，耗时耗财，并且说不定将来仍难免一战。与其如此，不如把战线推出去，在远离鸭绿江的地方击退美军。最终，支持出兵的一派意见占了上风。

甚至在这些会议进行期间，中国仍没有放弃政治上阻止美军过线的努力。10 月 3 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向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如果美军企图超过 38 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其实，此时美军早已在北朝鲜的领土上前进，只是由于情报不畅，中国政府还没有得知。

就在美国人继续进兵的同时，10 月 7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在朝鲜建立统一民主政权的“八国提案”。10 月 8 日，毛泽东发布正式命令， 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

中国方面在出兵决心已定的情况下，还需要解决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空军问题。1950 年，新中国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空军。缺少空中力量，志愿军即使入朝，也很可能在战场上成为抬不起头的靶子。为了保证胜利，中国必须争取苏联方面的空军援助。而根据中苏双方之前的大量通信，斯大林确实多次原则上同意给予中国军队以空军支援。但支援的具体方式、规模、范围，都没有商议过。为此，中共中央在基本决定出兵朝鲜之后，并没有急于通知斯大林，而是由周恩来紧急出使莫斯科进行了谈判。

关于 10 月 11 日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判内容，甚至周恩来此行的全部动因，由于资料有限，

至今尚无确切的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斯大林在会上突然提出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周恩来当即表示中国将暂缓出兵，并得到斯大林的同意---被迫的同意。这一点，可以从当天斯大林和周恩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看出来。“电报中说到，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43]在不能指望中国派兵增援的情况下，朝鲜局势实际上已经无法挽回。10月13日下午，斯大林即电告什特科夫，要他转告金日成，中国同志决定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把军队撤到中国东北苏联，并要什特科夫帮助拟订一个撤退计划。

令斯大林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方面的态度很快又有了变化。10月12日毛泽东接到前一天从莫斯科发出的电报后，急电在东北的高岗和彭德怀回京商议。13日中央又进行了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志愿军仍然入朝参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电告周恩来：

“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的结果，一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只要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在《远东 朝鲜战争》一书中，王树增写道：“据后来西方史料记载，当周恩来向斯大林表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也决定出兵时，‘斯大林流出了眼泪’，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尽管作者又说“不管这种传言是否可信”，但作者毫无疑问是在渲染一种浪漫的剧场效果。在我看来，这种传言毫无可信度，引用这种材料本身就说明作者不是以中正的历史眼光，而是以画家的眼光在观察史实。即使人们相信这个屠杀几百万人的独裁者真的在当时流了眼泪，那恐怕也是终于有人替他出头收拾残局而导致的得意之泪。

事实是，周恩来根本没有拿着电报去见斯大林，而是在当晚会见了莫洛托夫，要求转告电报内容。可即使是在中国方面做出这样巨大的让步后，中国出兵朝鲜的一波三折仍未结束。细

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此前中、苏从来没有就苏联空军的支援范围进行商议。由于苏方的措辞是“掩护中国部队”，因此，中方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包括进入朝鲜的中国部队。这样，即使志愿军入朝初期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可以期待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得到这种支援。中方于 13 日做出的决策，也是基于这一理解的。然而，当周恩来于 14 日把毛泽东的两封含有入朝作战区域、防御计划和“等待苏联空军”内容的电报转告斯大林后，斯大林却通过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

这一答复无疑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惊讶，他们没有料到狡猾的斯大林在这时突然亮出了一张不为他们所知的底牌。原来苏联长期允诺的空中支援，竟只包括志愿军的后方，即中国本土。那么，进入朝鲜的中国作战部队，面对敌军空中的压倒性优势，该怎么办呢？就是因为这一变故，导致了 10 月 17 日彭德怀和高岗的二次回京。

尽管资料没有公开，但史实已经告诉我们，这一插曲并没有改变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1950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朝鲜战争终于使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撞到了一起。

Gallent

2006.2.14 23:01

[注释]:

1: 1864 年,沙俄首相哥尔查科夫写道:“俄罗斯在中亚的情形, 凡与无固定社会组织半野蛮游牧民族接触之文明国均有此现象。此时, 为边界安全及贸易关系计, 较文明之一方势须对其邻邦享有某种权威。……或放弃此一长期使命, 听任其边界扰攘不安, 或一而再再而三深入蛮荒之地, 以致其最大困难在于如何收手。”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133

该节名为《现实政治自食其果》，对俄国外交传统有诸多精彩论述。

- 2: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一章 第一节
- 3: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一章 第二节
- 4: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一章 第二节
- 5: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一章 第二节

- 6: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一章 第二节
- 7: 这部记录片由于出自官方人员,原始的影音资料之充实令人羡慕,任何国际关系和历史的爱好者都不妨收藏
- 8: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399
- 9: 时殷宏 《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政治》 2005 年第 10 期 1-7 页
- 10: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376
- 11: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377
- 12: 威廉·内斯特 《国际关系 21 世纪的政治与经济》 姚远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7 月 P52
- 13: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400
- 14: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407
- 15: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405
- 16: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402
- 17: 杰弗里·罗伯茨 (Jeffery Roberts) 《莫斯科与西方关系破裂经过》
<http://www.coldwarchina.com/mgyj/lzqy/000726.html>
- 18: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427
- 19: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429
- 20: 张盛发 《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
http://www.coldwarchina.com/slyj/lzqy/000736_2.html
- 21: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432
- 22: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437
- 23: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三章 第一节
- 24: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三章 第一节
- 25: 王树增 《远东 朝鲜战争》 第一章 第二节
- 26: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四章 第一节
- 27: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三章 第二节
- 28: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三章 第二节
- 29: 杨奎松 《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战争?》
<http://www.yangkuisong.net/spsx/sp/000072.htm>
- 30: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三章 第三节
- 31: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三章 第三节

32: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三章 第三节

33: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三章 第三节

34: 牛军 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

<http://www.coldwarchina.com/mgyj/dhzc/000852.html>

35: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453

36: 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P451

37: 沈志华 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

http://www.shenzhihua.net/cxzz/000001_3.htm

38: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四章 第一节

39: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四章 第一节

40: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四章 第一节

41: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四章 第一节

42: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四章 第一节

43: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四章 第三节